

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分析

胡 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 软实力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摘要: 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来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红色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的实践文化。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的精神现象,其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与之相适应的。因此,政治文化一方面具有继承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社会实践保持相对的适应性。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创新。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趋势,对中国政治权威产生了冲击,对政治具有解构的作用,这不利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健康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 政治文化;文化探源;文化创新;发展态势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6-0003-08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HU Jian

(Soft Power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Academy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The sourc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s mainl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m, the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the practical culture created by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s the spiritual phenomenon of social politics,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determined by the socio-economic base, and is compatible with it. Accordingl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has the inheritance, on the other hand, must develo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and maintains the relative compatibility with the social practice.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innovate unceasingly in the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unhealthy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today, which has impacted on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China today, has the deconstruction function to the politics, and is unfavorabl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needs to build a healthy political culture.

Key words: political culture; cultural exploration; cultur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rend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的精神现象,其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且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反映和心理感知。其形成发展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全部社会生产关系所制约,受着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制约。但是,政治文化又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

收稿日期:2017-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软实力评估及增进方略研究”(编号:14BKS064)

作者简介:胡 键(1968-),男,湖南道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

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僇,故救僇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p277)}司马迁这段话强调了政治文化的承继与变革,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这无疑是最早论及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关系的文献。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社会经济基础对政治文化的决定作用,又要看到政治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历史文化对当今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当今中国政治文化探源

每当论及传统文化,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儒家思想,但最初影响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文化却是道家思想(尤其是“黄老思想”)。秦统一中国以后,尊法家而弱儒家。然而,法家两门(李斯、韩非子)乃荀子门徒,荀子继承的是儒家学说四科中的“政事”之科,在此基础上,荀子门徒韩非子创立了法家学说。也就是说,大秦帝国的主导政治文化虽为法家之理论,实则儒家之实质。然而,因当时众多儒士以古代经典(主要是指《尚书》)为依据,反对秦帝国实行郡县制。因此,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而实施“焚书”“坑儒”,禁止儒生“妄议国是”,凡私藏儒家书籍的也会被治罪。^①到了汉代,汉乃袭秦制,按照钱穆所说“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上是秦代之延续。”^{[2](p1)}不过,汉武帝之时,主导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改变,它既不是汉初采用的道家思想,也不是秦朝的法家思想,而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政权思想。这就是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尽管董仲舒的“儒家”并非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兼有道家、法家等的“大杂烩”,但他发展了儒家学说,特别使儒家思想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民国学人对此有一评论说,汉武帝尊重儒家之动机,“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3](p65)}

儒家与皇权的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而日益紧密,尽管道家学说依旧在中国的思想界占据重要位置。也正因为如此,儒生绝大多数成为皇权的拥护者,而完全丧失了西周时期儒生对皇权的批判性。因此,儒家学说逐渐陷入僵化,这为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领域的空间和社会基础。特别是佛教的思想与在汉朝初年一度成为治国思想的道家学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相互兼容的。“这两个出世的思想与儒家入世的思想,构成了一个辩证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代替。”^{[4](p6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强调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使道家更多的是作为儒学之外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补充而存在,特别是当社会中的官僚机构处于崩溃之时更是如此。作为大众化的道教,它可能意味的是农民起义,像东汉反对地主、儒家和官僚的黄巾起义;作为高深的道教,它可能意味的是士大夫从社会生活中急流勇退而成为3世纪的‘清谈’者,或‘竹林七贤’,或是满怀乡愁的唐朝诗人。”^{[5](p36)}到了宋代,士大夫们开始努力重塑中国文化传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把道学发展成为理学,但无论是道学还是理学,其构成的基石仍然是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经典。因此,“儒、释、道这三种思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6](p173)}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楠先生就指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的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这已经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法则。”^{[3](p6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又是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即政治文化的生产来巩固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只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全部。而当今中国政治文化更为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同时又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政治系统也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已经像血液一样溶于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之中。另外,信仰是构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政治信仰和政治认知最重要的内容在于主观对政治系统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试图重新构建一种政治文化,那就相当于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大换血,用另一种血液来代替其体内原有的血液。这就难免不会产生排异现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要“不忘初

① 参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心”,不仅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也要始终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而努力。这是最根本的“初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发展并建立了全国政权,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胜利。反过来,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也必须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服务,并以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由全面发展”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核心内容。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7] (p456)}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走向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8]这种观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去马克思主义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就会丧失精神支柱。在这方面,苏联共产党的亡党亡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苏联共产党是百年大党,最后彻底土崩瓦解,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则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改革就会陷入误区;同样,不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一直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最终仍然会失败。因此,认为中国的未来道路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实际上就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会走上绝路。^{[9] (p232-235)}

总之,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来源还是多方面的,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文化等综合因素合力形成的。这种情形表明,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要素具有多元性,其内涵具有包容性,其主线则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二、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创新

政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政治文化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那就意味着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必须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前文是对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寻根,但中国政治文化究竟如何发展才是关键。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还必须回到其主要起源上去讨论。

第一,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是要解决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需要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0] (p133)}首先是对传统文化要欣赏、自信,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其次,要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创造的文化要欣赏,尤其是对其优秀的成果要敢于、善于“拿来”,不能搞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夜郎主义”,否则就是文化自负。文化自负表现为:一是拒绝一切外来文化,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犹如在极“左”时期的口号“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愿要资本主义的苗”。问题是,“苗”并不以“主义”来区分的,只要长在社会主义的田里,它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苗”。文化也是一样,关键是使用文化的人能不能正确地对待和使用文化。二是对中国模式顶礼膜拜。近一段时间对“中国模式”冷静多了,前几年几乎把“中国模式”炒爆了,认为中国模式是尽善尽美的模式,因为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300年的现代化之路,因此,“中国模式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非西方模式”,等等。文化自负必然会拒绝改革,拒绝市场经济,也不承认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甚至会把中国的问题也当作优点来赞扬。文化自负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再次,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交流、对话,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世界上没有单质文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来实现的。尤其是当今诸多全球性的问题,诸如气候变化、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都是跨国、跨地区的问题,任何国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就是要走向“天下大同”,也即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当今中国外交上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上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当今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一直存在着问题。一种问题是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僵死的教条来对待。结果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最终导致政治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严重僵化和刚性化。苏联共产党的情形属于这种情况,苏共因意识形态的刚性化而难以适应21世纪的社会主义,最终亡党亡国。对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问题,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给予了驳斥,并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 (p115)}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时期,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仍然存在,原苏联比较严重,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僵化和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它必须在实践中发展。只有随着实践发展的理论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另一种问题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即所谓的“过时论”。虽然有关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论调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已经出现,但这种论调很快被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所否定。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又甚嚣尘上,最典型的在西方就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种理论是否过时关键还要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1] (p111)}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在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尤其《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但马克思《资本论》也是关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或者说是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它的研究对象不限于“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还包括“‘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12] (p47)}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3] (p114)}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而资本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进程。迄今为止,资本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并没有改变,但由于资本无法克服自身的本性而导致治理的无效。^[14]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今时代的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时代周期性经济危机在今天的延展。^{[15] (p248)}因此,这样的实践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第三,革命文化的传承问题是要解决革命文化的归属问题。红色文化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革命文化就是当今所说的红色文化。当前有一种错觉,认为红色文化的传承者就是“红二代”、“红三代”,其他人与红色文化是没有关系的。这与当年流行的“贫下中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是一样的,是错误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化,其传承者不只是“红二代”、“红三代”。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拥护革命的所有人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创造者,因而这些人及其后人就都是红色文化的传承者。然而,有的人把红色文化视为今天“红二代”、“红三代”的专利,并以此来与普通民众“划清界限”,甚至标榜自己的“红色正统”。这是脱离群众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人民群众。苏共亡党亡国的内部原因,就在于苏共脱离群众最终导致在苏联政治生活上形成一个政治毒瘤——特权阶层,也就是所谓“高干花名册”上的人。他们是在斯大林时期就逐步形成起来,“这些人……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16]它是识别苏联特权阶层的最好标志。^{[17] (p17)}正是这个政治毒瘤从内部瓦解了苏联共产党乃至整个苏联。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在21世纪推进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就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党就会失去根基。必须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要求。”如果用红色文化把党与人民隔离开来,那么就意味着以红色文化在党与人民之间构筑了一道厚厚的文化篱笆。

第四,新技术条件下中国政治文化的适应问题。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必须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从而推进国家治理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一直都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以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产的需要。苏联和苏共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用行政的力量有限发展重工业,短期内弥补了生产力落后的情形。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推广与应用成为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在经济竞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18] (p932)}当今,新技术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无疑受到技术发

展的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政治文化既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要能够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多元文化、多样思潮格局。

三、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态势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其一,蒙昧型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公民既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其二,服从型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作出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愿。其三,参与型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公民既对政治参与保持适度的热情,又对合法的权威保持充分的尊重。^{[19] (p504)}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政治系统中都不是单一类型的政治文化在起作用,而是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都在发挥作用。因为政治系统中不是单一角色而是存在着多种角色的,而不同的角色都有自己的一套信念和价值观。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转型,社会主体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复杂性现实,并通过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表现出来,进而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态势表现为:

第一,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中国有对权威崇拜的历史传统,而且对权威的崇拜往往表现为对具体个人的崇拜。在封建专制时代,民众崇拜的是皇帝,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众对皇帝的崇拜也就在所难免。进入近代以后,民主思想的确开启了民智,但崇拜权威的思想并没有被民主思潮涤荡干净。毕竟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是长期的持久的。所以,中国民众对胜利者总是充满了崇敬之情,崇敬往往转化为对个人的崇拜。今天,虽然在和平时代,但对权威的崇拜仍然有增无减。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所遭遇的困境需要权威,包括深化经济改革、惩治腐败等触及制度基础的问题,没有权威可能会浅尝辄止,难以撼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对权威的崇拜也有可能演变为个人崇拜。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完全仰仗某一个人的政治体制是最简单的政治体制。同时,这种体制也是最不稳定的。”^{[20] (p15)} 实际上,邓小平当年也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21] (p311)} 按照萨托利所说的,少部分的决策,其决策成本主要是心理上的,但给集体(国家)带来的风险却是巨大且现实的。^{[22] (p245)}

当然,一切问题都不是单向化发展的。尤其是民众的态度往往从多方面呈现出中国政治文化的多向性发展。一边是崇拜权威,另一边却是用语言符号解构权威。尽管现实的政治生活没有为民众提供解构权威的路径,但民众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种渠道对权威进行解构:一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工具。民众借助于语言这种符号来建构政治话语,对政治权威施加符号暴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政治权威。二是网络,开放性、交互性的网络为草根对政治权威的解构提供了路径。由于长期以来政治权威与底层社会的相对隔离,民众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往往是极化的,要么顶礼膜拜,要么以草根的方式用符号暴力施加伤害。语言和网络的解构方式,基本上属于符号暴力,也就是对政治权威施加符号暴力,特别是通过制造各种政治谣言来稀释健康的政治信息,从而降低政治中心的权威性。“丰富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23] (p15)} 借助于网络来散布不健康的政治信息,也会导致健康政治信息的关注度下降。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底层的信息而不是政府的权威信息,因为政治权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被解构,而且政治权威本身也因执政过程中的失误、错误而在自我解构。结果,越是底层的信息越被认为是真实的。这样,政治权威就陷入到“塔西佗陷阱”之中。

第二,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中国政治在较长时期内是比较封闭的,至少可以说开放程度不高,因而不透明的,不透明的政治必然会导致政治神秘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完全是一种神秘政治运作,民众对宫廷政治的了解基本上限于“传闻”。封建统治者往往借助于谰语来构建其政治合法性。然而,一些民众也渐渐熟悉了这套政治动员术,于是也运用谰语来动员底层群众以夺取政治权力。如果回顾一下中国的农民战争史,我们会发现农民领袖基本上是借助于政治神秘感用谰语来动员民众的。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由于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渐进引发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神秘感,使革命领袖在和平时期逐渐与民众隔离开来,并走上了神坛。但是,现代政治是一个透明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政治,现代政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治运作的透明性,以及政治生活去神秘化。现实的情况可能与客观的

要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政治神秘感仍然作为政治的外衣而披在政治权力之上。政治神秘感给政治谣言提供了制度性土壤。^[24]同样,政治神秘感也给政治戏谑提供了生存空间。

政治戏谑的主体既可能是来自上层的政治精英,也有可能是来自底层的黎民百姓。来自上层精英的政治戏谑往往是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对权力的异化来诠释政治的。例如,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政坛“大老虎”到掌握一定权力的基层“苍蝇”,都是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对政治进行戏谑和反讽。在台上,他们代表着国家机关使民众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代表。这是因为“国家对正义负有责任”。^{[25] (p11)}作为国家的代表就是正义的代表。但当腐败暴露之后,民众才知道他们也是有私利的凡人,而不是超脱了私利的政治道德标杆。这样的反差会引发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的戏谑。其实,无论是上层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其他各阶层,对政治的戏谑都是用“双面人现象”来表现的。有一段时间,电视剧都在播“戏说历史”,但如今是现实中的社会成员在“戏说”当今政治,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的调侃与戏谑。

第三,从政治狂热到政治冷漠。革命的年代总会与政治狂热相伴的。因为,正是政治狂热促发了人们对政治的极大热情,进而对原有政治产生不满。革命尽管有种种崇高的理由,但对个人来说与其对政治的热情和对原有政治的不满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某种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狂热所致。“文化大革命”的后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走出这种政治狂热之后,本该走进一个理性的时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社会很快进入一个经济狂热的时代。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没有经历一个文化反思和重建的过程。由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破坏了中国的政治秩序,但它是以“破四旧”的文化口号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文化所受到的伤害比政治所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传统文化一律被作为腐朽的东西而被“文化大革命”摧毁,道德、伦理、习俗等一切传统文化都在无所敬畏的政治狂热下颠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客观上要求中国社会有一个文化反思和重建的过程,但面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民众,中国共产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先解决人的基本需求问题。经济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由于经济改革非常紧迫,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的一股“文化热”如昙花一现而被埋入历史。90年代初启动的市场经济进程,进一步把可能的文化复兴之“星星之火”再一次扑灭。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到了市场经济的热潮之中,人们不再相信理想、信念、道德、操守、诚信、责任等,只相信一种东西:金钱。金钱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于是所有的人都在为金钱即所谓的成功而焦虑。底层的人因没有钱而焦虑,社会中层为挣更多的钱和步入上层而焦虑,上层有钱的人为更多的钱而焦虑。结果,整个社会为了金钱而不断触及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商交易、权学交易等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至于政治究竟怎么发展,政治信仰如何,道德是否滑坡等,这一切都被社会所忽视,从而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冷漠之中,尤其表现为政治冷漠,也就是对政治的态度表现为无所谓,或者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熟视无睹。

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6] (p144-145)}这里所指的就是政治冷漠。政治冷漠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是各种政治谣传。邓小平早就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26] (p145)}二是另类政治抗争。冷漠表现为另类政治抗争,也许它表现为对政治的不关心,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不满,而对政治的不满,却源于现实政治秩序造就了人们对金钱的焦虑即对成功的焦虑感,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恐慌。此外,政治冷漠也表现为人们对道德的冷漠。这一切触及人类道德底线的问题皆源于一个词:焦虑。而对成功、对金钱的焦虑,则源于政治冷漠和道德冷漠。政治冷漠处于一个社会爆发的临界点,如果没有好的引导之策,临界点上的爆发就是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第四,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政治迷信是指对政治权力的盲目信任或盲从。中国传统文人一直就坚持“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的原则。所谓仕就是官员,而官员则是拥有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对权力充满了欲望,从来对权力都充满了入世情怀,因此,对权力是十分迷信的。对权力的盲从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以真理为标准,而是唯上,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就是因为干部的晋升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为了获得更多的升迁和更大的权力,就势必把上级领导作为唯一的真理来伺候了。可见,根本上还是在官员升迁的制度设计上。这就是盲从所致,政治迷信所致,更是对权力的迷信所致。王亚楠先生早就对此有论述“中国人传统的把做官看得很重要,我们有理由说是由于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教了一套修齐治平的大道理;我们还有

理由说是由于实行科举制,鼓励我们“以学干禄”,热衷于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3] (p111)}

对政治权力的盲从,反过来是对群众的欺骗,也就是欺下瞒上。国家的道德立场是指政治的正义性。^{[25] (p21)} 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原本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因而也就代表了政治的正义性。然而,由于掌握权力的人一心想着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们不仅对民众极尽欺骗之能事,而且他们对政治信仰、意识形态都视为权力上升的阶梯。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学者阿福托尔哈诺夫描写苏共内部特权阶层曾说过“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社会地位;不是国家哲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沿着它可以爬到国家顶峰的那个不太牢靠的阶梯。”^{[27] (p43)} 这虽然是说当年苏共内部的情形,但对今天中国共产党还是有重要的警示作用。这样一群人代表着国家、代表着政府,民众又如何相信国家和政府呢?所以,一方面是政治迷信,另一方面则是对政治的极度不信任。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政府的话你也信?”这不是说政府出了问题,而是代表政府、代表权力的人出了问题。由于他们代表政治权力和政府说的话,民众无疑就会认为他们的话就是政治权力和政府所说的话。更危险的是,说“两面话”、做“双面人”已经成为政坛常态,因而,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也就成为一种常态。

第五,从现实政治参与到虚拟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本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正常现象。只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才能够实现正常的政治表达,从而使政治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正如前文所述,民众的现实政治参与,不仅受制于制度设计,也受制于自身的政治角色,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尤其是当我们的民主政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受制于低层次政治角色的大多数来说,现实的政治参与渠道可能并不十分畅通。而互联网则开通了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渠道,使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诉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网络政治文化。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网络政治文化是最发达的。从网络谣言、网络维权、网络反腐、网络举报、网络政治议程设置等,都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进程,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网络文化,一方面有利于完善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提高中国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网络文化也给现实政治带来巨大压力。政治本应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其议程也是十分庄重的,但网络政治文化却充满了政治调侃和政治戏谑乃至政治反讽。这样,网络文化不仅进一步在解构现实政治的权威,消解现实政治议程的严肃性和庄重性;而且,网络政治文化也充斥了各种不满、抱怨的信息,从而抵消了健康政治信息的关注度,使民众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网络空间中丧失了政治文化的自主性。社会的不满往往是从对自己单位、自己部门的不满开始的,对单位、部门的资源分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性的抱怨,很快就会通过网络而传播开来,对单位、部门的不满很快就会迁怒于整个权力体系、官僚体系。因为在民众看来,所有的不公平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是权力至上而不是以正义为原则的,是官僚体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和部门的具体表现。于是,对本单位、本部门的抱怨通过网络会演化成为众多网民对整个权力体系、官僚体系的不满,并通过网络语言进行政治抗争。

四、建设健康政治文化的思考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政治文化的状况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对构建当今中国健康政治文化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从执政党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长期执政,但党不允许党的任何成员在思想上在执政地位的问题上有一劳永逸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如果不加强自身建设,且始终坚持人民立场,那么,就有失去政权的风险。当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来跳出历史周期率。“人民民主”不只是当年的政治发展目标,同样也是当今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二,从国家的角度看,政治文化要为国家总体发展服务。当前中国的总体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就是“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因此,政治文化的构建也必须围绕“四个全面”推进,并且要为“四个全面”营造舆论环境。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当今政治文

化的复杂性和政治思潮的多样性,国家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国家的价值观来引导。当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引领国家政治建设的旗帜。

第三,从社会的角度看,政治文化的建设要发挥正面引导作用。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经过加速转型以后,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这对主流思潮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因此,政治文化建设既要适应社会思潮多元化的现实,又要为主流意识形态发挥指导作用夯实基础。

最后,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文化建设要以培育合格公民为目标。过去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过多地强调了政治性教育,并试图把社会每一个成员都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来培养,但忽视了公民教育。结果是,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未来“共产主义接班人”,但相当多的社会成员却连合格的公民标准都没有达到。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文化建设在社会个体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国家的未来目标与社会个体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3]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4]许倬云.中西文明的对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5]〔美〕约瑟夫·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任菁译.广西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
- [6]楼宇烈.中国的品格[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J].读书,2007(6).
- [9]胡键.理解中国的改革: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
- [10]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胡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的全球治理[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1).
- [15]胡键.资本的全球治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6]陆南泉.苏联走进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J].东欧中亚研究,2001(6).
- [17]〔英〕默文·马修斯.七十年代的苏联权贵[A].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 [18]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9]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20]〔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23]〔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4]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J].社会科学,2004(2).
- [25]〔德〕奥德弗里德·赫费.政治的正义性[J].庞学铨,李张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7]〔苏〕阿·阿福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M].杨春华,张道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郭荣华)